

石玉昆《侠义传序》考论

宋克夫

《侠义传》，全称《忠烈侠义传》，亦名《三侠五义》。1992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吴晓铃藏、石玉昆序的《忠烈侠义传》抄本。这是目前唯一现存的保留着石玉昆《侠义传序》的版本。由于这个本子为吴晓铃先生藏本，一直都未公之于世，鲜为人知。此次公开出版，无疑会给《忠烈侠义传》的研究提出诸多课题。而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，是石玉昆《侠义传序》的真伪。

在学术界，唯一提及过石玉昆《侠义传序》的是胡士莹先生。在《话本小说概论》中，胡先生在没有列举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断言：“吴晓铃藏抄本《忠烈侠义传》，序言题‘道光二十八年春三月，石玉昆’。疑坊贾作伪牟利者所为。”这一结论无疑有些轻率。通过对《侠义传序》的内容，石玉昆的活动时期和文光楼主人《小五义序》的考查，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这篇《侠义传序》确实出于石玉昆之手。其主要根据如下。

一

在《侠义传序》中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

是书本名《龙图公案》，又曰《包公案》。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，从此书内又续成六十多本。虽是传奇志异，难免怪力乱神。兹将此书翻旧出新，添长补短，删去邪说之事，改出正大之文。……无论此事有无，但能情理兼尽，使人可

以悦目赏心，便是绝妙好辞。此书一部中，包公本是个纲领，起首应从包公说起，为何要先叙仁宗呢？其中有个缘故：故只因包公事繁，仁宗事简，开口若说包公降生，如何坎坷，怎么受害，将来仁宗的事补出来，反觉赘笔。莫若先君后臣，将仁宗事叙明，然后再言包公降生，一气文字贯通，方不紊乱；就是后文草桥遇后时，也觉省笔，读者一目了然。

这段文字，也见于吴晓铃藏《忠烈侠义传》抄本第一回，不过稍有不同：

《龙图公案》一书，原有成稿。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，野史内续了四十多本。虽则传奇志异，难免鬼怪妖邪。今将此书翻旧如新，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，另具一番慧心妙笔，所以生出惊天动地之文。……无论此事有无，但能情理兼尽，便是绝妙好辞了。此书既名《包公案》，起首就应从包公说起，为何先说仁宗呢？其中有个缘故：只因包公事繁，仁宗事简，开口若说包公降生，如何坎坷，怎么受害，将来仁宗的事补叙出来，反觉赘笔。莫若先君后臣，将仁宗的根由叙明，然后再叙包公，方不紊乱；就是后文草桥断后，也觉省笔，听书的也觉明白。

这两段大同小异的文字透露出一个消息，那就是《侠义传序》是根据《忠烈侠义传》第一回改写的。那么，第一回的这段文字是否出自石玉昆说书的底本呢？回答是肯定的。

在谢蓝斋抄本《龙图耳录》的卷首，有一段文字与上引《忠烈侠义传》第一回文字几乎完全相同。只是《忠烈侠义传》中“野史内续了四十多本”，《龙图耳录》作“野史内续了六十多本”；《忠烈侠义传》中“今将此书翻旧如新”，《龙图耳录》作“今将此书翻旧出新”；《忠烈侠义传》中“另具一番慧心妙笔”，《龙图耳录》作“另具一番慧妙”；《忠烈侠义传》

中“所以生出惊天动地之文”，《龙图耳录》作“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”；《忠烈侠义传》中“起首就应从包公说起”，《龙图耳录》作“就应从包公说起”；《忠烈侠义传》中“只因包公事繁”，《龙图耳录》作“只因包公的事繁”；《忠烈侠义传》中“开口若说包公降生”，《龙图耳录》作“开口若先说包公降生”；《忠烈侠义传》中“就是后文草桥断后”，《龙图耳录》作“就是后文草桥遇后”；《忠烈侠义传》中“听书的也觉明白”，《龙图耳录》作“听书也觉明白”。而据孙楷第先生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所云：《龙图耳录》一书，“诸本多无序跋。余藏抄本第十二回有抄书人自记一行云：‘此书于此毕矣。惜乎后文未能听记。’知此书乃听《龙图公案》时笔受之本。听而录之，故曰《龙图耳录》。”“所录即石玉昆所说之辞矣”。由此看来，上述《忠烈侠义传》第一回文字，乃石玉昆说书时的实际内容。

基于以上事实，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：

第一，从《侠义传序》的内容来看。《侠义传序》的文字与《忠烈侠义传》第一回的文字及石玉昆说书的实际内容基本一致，前者显然是根据后者改写而成的，作者自然是石玉昆。

第二，从《侠义传序》的风格来看。《侠义传序》主要介绍了《忠烈侠义传》的创作动机和艺术构思。其中着重说明了“先君后臣”的叙事方式着眼于怎样的考虑。行文朴素，不施藻饰。这样的语气和风格，也符合石玉昆作为一个说书艺人的职业身份和文化修养。

二

《侠义传序》题署曰“道光二十八年春三月石玉昆”。那么，要论定《侠义传序》出自石玉昆之手，还有一个必须说明的问题，那就是在道光二十八年，即1848年，石玉昆是否有作《侠

义传序》的可能。

在1961年富察贵庆的《咏石玉昆》诗被发现之前，石玉昆的活动时期对于世人来说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。鲁迅先生写于1924年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推测“石玉昆殆亦咸丰时说话人”。胡适先生写于1925年的《三侠五义序》则说：“石玉昆的事迹，现在还无从考起。”^①孙楷第先生完成于1932年的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说：石玉昆“咸、同间鬻伎京师。”李家瑞在1934年发表在《文学季刊》一卷二号上的《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》则认为：石玉昆“咸丰、同治时候尝以唱单弦轰动一时”，“大约死在同治末年。”直到1940年，对《忠烈侠义传》研究造诣极深的赵景深先生在其《关于石玉昆》一文中仍然认为：“究竟石玉昆生在什么时候，我们还不能断定，那么，只有等材料多些的时候，才能断这个悬案了。”^②坊贾作伪是为了牟利，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就必须投学术界之所好。在石玉昆活动时期尚无定论，而鲁迅、孙楷第、李家瑞诸先生认为石玉昆为咸丰、同治间人的情况下，如果《侠义传序》真系伪托，那么，作伪者完全可以按当时学术界对石玉昆活动时期的猜测，把石玉昆作序的时间署为咸丰或同治年间，这样做无疑更容易得到学术界的认可，以达到牟利之目的。而《侠义传序》的写作时间竟然言之凿凿地署为“道光二十八年春三月”，如果是作伪，不是明摆着要留下嫌疑？这样作伪，岂不太笨拙了一些！胡士莹先生在1980年出版的《话本小说概论》正是因为《侠义传序》“编写的时间也提前了”而断为“作伪”，即是证明。

那么，在道光二十八年，石玉昆是否有作《侠义传序》的可能呢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就必须明确石玉昆的活动时期。现在有两条材料可以证实石玉昆的活动时期主要是在道光年间：一是金梯云《子弟书》抄本中的《叹石玉昆》，一是富察贵庆《知了义斋诗钞》中的《咏石玉昆》诗。

金梯云《子弟书》是道光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（1843年—1845年）间的抄本。其中的《叹石玉昆》描述了石玉昆说书的精湛技艺：“他款定三弦如施号令，满堂中鸦雀无闻，但显他指法玲珑音嘹亮，形容潇洒字句清新。令诸公一字一夸一句一赞，众心同悦众口同音。”正是因为石玉昆技艺精湛，所以在当时声誉极高：“高抬声价本超群，压倒江湖无业民，惊动公卿夸绝调，流传市井效眉颦，编来宋代包公案，成就当时石玉昆。”由此看来，至少是在道光二十五年之前，石玉昆就以说《包公案》誉满京城了。

富察贵庆，号月山，满族人。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翰林，官至礼部尚书，晚年寓居北京西山。据吴英华、吴绍英《有关〈三侠五义〉作者的一首可贵的诗》考证，富察贵庆“可能生于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左右，卒于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以后”，其《咏石玉昆》诗“作于道光十七年以前”^③。这首诗高度评价了石玉昆说书的技艺和孤傲的人格：“攀条轶事吊斜曛，绝技风流又属君。一笑史从何处说，廿年人得几回闻。么弦切切秋虫语，大笠飘飘野鹤群。为底朱门无履迹，曳裙应怪太纷纷。”胡士莹先生据此推论：“《咏石玉昆》诗，作于晚年寓居西山，那时石玉昆当在中年，否则他的说书技艺不会达到成熟的境地。因此，我们推测石玉昆当生于嘉庆十年（1805）左右。”^④胡先生的思路是不错的，但他似乎没有仔细去推敲这首诗前的一段小序：

“石生玉昆，工柳敬亭之技，有盛名近二十年，而性孤僻，游市肆间，王公招之不至。”富察贵庆写《咏石玉昆》时，石玉昆已经“有盛名近二十年”，故其诗曰“廿年人得几回闻”。以道光十七年上推二十年，则是嘉庆二十二年（1817年）。而按胡先生石玉昆生于嘉庆十年的说法，在嘉庆二十二年，石玉昆只有十二岁。十二岁的小孩，怎么可能“有盛名”呢？当然，这里的“有盛名”也许是以恭维的说法代指石玉昆登台说书，那也应该

有十七、八岁。如果石玉昆在嘉庆二十二年十七岁时开始登台说书，那么，他的生年应当在嘉庆五年，即1800年左右。

由上述两条材料互为参照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石玉昆大约生于1800年，在道光十七年前后已经以说《包公案》极具盛名。道光二十八年，石玉昆大约四十八岁，完全有可能作《侠义传序》。

三

我们知道，石玉昆说书的底本是唱本，而吴晓铃藏《忠烈侠义传》抄本则是章回小说。石玉昆作《侠义传序》还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他必须有作为章回小说的《忠烈侠义传》原稿。那么，石玉昆是否有章回小说《忠烈侠义传》原稿呢？文光楼主人的《小五义序》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：

《小五义》一书，何为而刻也？只以采访《龙图阁公案》底稿，历数年之久，未曾到手。适有友人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，偶在铺中闲谈，言及此书，余即托之搜寻。友人去不多日，即将石先生原稿携来，共三百余回，计七十八本，三千多篇，分上中下三部，总名《忠烈侠义传》。原无大小之说，因上部《三侠五义》为创始之人，故谓之大五义；中、下二部五义，即其后人出世，故谓之小五义。余翻阅一遍，前后一气，脉络贯通，与坊刻前部，略有异同。根据这段记载，石玉昆有章回小说《忠烈侠义传》“原稿”。问题在于，这段记载是否可靠？1925年，胡适先生曾在《三侠五义序》中认定：文光楼主人“《小五义》序里的话是不可靠的”。胡适先生的这个结论导源于《忠烈侠义传》刊本结尾的一段文字。

《忠烈侠义传》的刊本首次出现于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在这之后的《忠烈侠义传》刊本的末尾，均有关于续书的要目预

告：

要知群雄战襄阳，众虎遭魔难，小侠到陷空岛茉花村柳家庄三处飞报信，柳家五虎奔襄阳，艾虎过山收服三寇，柳龙赶路结拜双雄，卢珍单刀独闯阵，丁蛟丁凤双探山，小弟兄襄阳大聚会，设计救群雄；直到众虎豪杰脱难，大家共议破襄阳，设圈套捉拿奸王，施妙计扫除众寇，押解奸王，夜赶开封府，肃清襄阳郡，义叙铡斩襄阳王，包公保众虎，小英雄金殿同封官，颜查散奏事封五鼠，众英雄开封大聚首，群侠义公厅同结拜；多少热闹节目，不能一一尽述。也有不足百回，俱在小五义书上，便见分明。

通过这段要目预告和《小五义》情节的比较，胡适先生指出：

“《三侠五义》的末尾有续集的要目，其中不提及徐良；而《小五义》以下，徐良为最重要的人”；“《小五义》中，沈仲元架起颜按院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关键”，“末尾的要目预告里没有沈仲元架跑按院的话”；“《三侠五义》末尾预告续集‘也有不足百回’，而《小五义》与《续小五义》共有二百几十回”。从而论定：文光楼主人是在“扯谎”，他的“话大概不可相信”。^⑤

在这里，我们想要说明的是：文光楼主人并没有“扯谎”。因为吴晓铃藏《忠烈侠义传》抄本的末尾压根就没有这段近二百字的要目预告，而只有“不知下文如何，俟有续者，再听分解”寥寥数语而已。那么，这段要目预告从何而来呢？刊行于光绪五年的《忠烈侠义传》前，有一篇入迷道人的序，其序曰：

辛未（1871年）春，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，爱不释手。……是以草录一部而珍藏之。乙亥（1875年）司榷淮安，公余时从新校阅，另录成编，订为四函，年余始获告成。

这段要目预告也许就是入迷道人经过一年多的“从新校阅”，“参合删定”^⑥的产物。故文光楼主人《小五义序》云：“石先

生原稿，……与坊刻前部，略有异同。”显然，这段要目预告并不是出于《忠烈侠义传》原稿，而是入迷道人后来加入的。如果说这段要目预告与《小五义》的情节不合，那只能说明入迷道人后来加入的预告并不准确，而不能说明文光楼主人在《小五义序》中“扯谎”。由此看来，胡适先生对文光楼主人“扯谎”的指斥，实在是冤枉文光楼主人了。

既然文光楼主人的话不是“扯谎”，那么，其《小五义序》中关于石玉昆有《忠烈侠义传》“原稿”的记载无疑是可信的，石玉昆《侠义传序》自然也不会是伪托了。

如果上述考论能够成立，《侠义传序》确系石玉昆所作，那么，将会给《忠烈侠义传》的研究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，如石玉昆和问竹主人的关系，《忠烈侠义传》抄本与刊本及《龙图耳录》的关系等。这些问题，笔者将另外撰文探讨。

注：

- ①⑤《中国章回小说考证》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421页
- ②《中国小说丛考》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480页
- ③《天津日报》1961年8月29日
- ④《话本小说概论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9页
- ⑥退思主人《忠烈侠义传序》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